

美国 联邦调查局

——我在胡佛手下的三十年

威廉·萨利文著

知 识 出 版 社

美国联邦调查局

——我在胡佛手下的三十年

〔美〕威廉·萨利文著

云良辉译 文尔书校

知 识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威廉·萨利文曾任美国情报机关联邦调查局局长助理，在局长胡佛手下工作了三十年。本书是他撰写的回忆录。书中记述了联邦调查局特务对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盯梢、监视、窃听和毁谤，对六十年代后期崛起的美国青年反战运动的破坏和镇压，对轰动一时并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等等，都有详尽的叙述，提供了揭露联邦调查局特务活动的第一手材料。

(内部发行)

美国联邦调查局

〔美〕威廉·萨利文著

云良辉译 文尔书校

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定门内外大街东街甲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间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 字数 195千字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100

书号：11214·6 定价：0.87元

序 言

我第一次见到比尔·萨利文^①是在1968年夏天，当时我正在进行初步的研究工作，准备摄制一部关于越共的电视纪录片，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反战积极分子同共产党国家到底有多少接触。约翰逊政府当时对我们说，那些示威游行的战斗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本国和外国的共产党人鼓动起来的。我想弄清楚当时的反战组织是否受过北越人或俄国人的训练或得到他们的资助。我给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总部打了一个电话，要求会见该局的刑事档案处。大家都知道，该处起的作用有点象是联邦调查局的新闻中心。

虽然我在联邦调查局没有一个熟人，但是我仍然获准会见一位高级官员，即情报处副处长威廉·萨利文。我当时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以为会听到一通官腔，大讲什么有多少反战的人受了共产党的煽动，甚至拿共产党的钱。

萨利文是个利索的矮个子，讲话条理清楚。他给我的总印象是带有新英格兰口音的詹姆斯·卡格内式^②人物。他的谈话使我大吃一惊。我没有料到联邦调查局的一位官员竟会对一个陌生人讲这样的话。萨利文说：“反战的人中间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同共产党国家有联系。至于美国共产党嘛，它根本不值一提。这个党现在已经无足轻重。绝大多数反对这场战争的青年人都很单纯：他们是爱国的青年，但是他们下定

① 比尔（Bill）是威廉（William）的昵称。——译注

② 詹姆斯·卡格内（JAMES CAGNEY），美国电影演员。——译注

决心要使美国退出越南战争。”

在以后的几年中，比尔·萨利文同我经常会面。每次会见时他总要赞扬联邦调查局的基层工作人员，并咒骂胡佛强调公共关系和缺乏判断力。

1971年胡佛迫使萨利文离开联邦调查局。当时萨利文是气愤的，但他仍然有决心在他为之工作了三十年的那个部门进行改组时起点作用。我确信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当联邦调查局局长；他想要做到的只是决不再让胡佛那种拥有非分政治权力的人当上联邦调查局的首脑。

萨利文离开联邦调查局几年之后，开始同我谈到他打算写一本书介绍他在联邦调查局的经历。他说，这本书将澄清事实真相，使公众能有机会了解联邦调查局的内幕。他要求我帮忙。

在随后的两年中我同他会见过十多次，有时在新罕布什尔州他的家里，有时在他的原籍马萨诸塞州波尔顿镇附近。他精力充沛，说话很快，记忆力很强。在这些接触中，有一点很突出，那就是每当引用胡佛的话（而他是常常这样做的）时，他总是提高嗓门，用的是冷冰冰的、极为刺耳的声调。

1977年7月，我把萨利文想要讲的关于联邦调查局的全部材料都整理出来了。那时我们已经准备最后把这本书定稿。但11月9日我从电讯稿上看到他在新罕布什尔州他家附近的森林里打猎时不幸死亡的消息。接着我又看到苏联塔斯社发的消息，怀疑他不是死于偶然事故，并暗示他是由于知道的事情太多而死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之手。我乘飞机到萨利文的家里，参加了葬礼，同地方官员和他的家属进行了交谈。我同他们一样，相信他确实是由于偶然事故而不幸逝世。

下面是比尔·萨利文的著作，每一个字都是他的：有的是他谈话的记录，有的是他写的草稿。这本书是萨利文关于他在胡佛的联邦调查局任职三十年的自述。

比尔·布朗
1979年3月纽约市

目 录

序言

第一章	结局和开始·····	(1)
第二章	罗斯福、杜鲁门和艾克·····	(25)
第三章	“让肯尼迪兄弟见鬼去吧!” ·····	(36)
第四章	约翰逊的工具·····	(47)
第五章	为联邦调查局作广告·····	(68)
第六章	生活在马戏团中·····	(89)
第七章	大权在握的人·····	(101)
第八章	民权与侵犯民权·····	(108)
第九章	小马丁·路德·金·····	(119)
第十章	新左翼·····	(130)
第十一章	谍报活动·····	(147)
第十二章	尼克松时代·····	(183)
第十三章	不再冒风险·····	(190)
第十四章	十七条电话窃听线路·····	(204)
第十五章	约翰·迪安和管子工·····	(216)
第十六章	门上加锁·····	(226)
附录一	休斯顿的备忘录·····	(241)
附录二	萨利文致约翰·迪安的备忘录·····	(251)
附录三	胡佛与萨利文间最后的书信往来·····	(255)

第一章 结局和开始

1971年9月30日，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会见。胡佛在大喊大叫：“从我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以来，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的信；也从来没有人象这样对我说话。”

我回答说：“要是过去有人对你讲过这样的话，那么今天我就不会有必要这样对你讲话。其实我早就该把这些事都告诉你。”

胡佛双眼盯着放在他办公桌上的我那份备忘录说：“我曾经多次因为我们之间的这场争论而向上帝祷告。”

这个老骗子！居然乞灵于祷告，这在他看来真是破天荒的事。几天之后我回想这次的会见时，才想到我应该回答他说，“胡佛先生，那就让我们立即在这个地方跪下来祷告吧”。

但我当时没有这样回答他，而是对他说，他用高压手段统治联邦调查局，连多年来在局里忠心耿耿地服务的人也害怕他。我还补充说，我不会再让他吓倒，我把自己从开始当特工人员起就想说的话统统对他说了。

等我讲完话，他气得满脸通红，讲话结结巴巴。最后他吼道，“显然你对我的领导没有信心。”

我回答说：“对，这是再清楚不过了。”

“你对我的管理不再有任何信心。”

我又表示同意，“对。我认为，如果你肯退休的话，那就是给国家帮了大忙。”

“哼，我不会退休”，他顶回来，眼睛还盯在我写的那封信上。“参议员格林直到九十岁还留在参议院。”

他顿了一下，想让我记住这句话。然后他终于第一次抬起头来，我们互相对视。

“我已经同司法部长米切尔谈过了，他同意我的意见，应该被撵走的是你。我同尼克松总统谈过这个问题，他也同意。”

我拂袖而出。

第二天早晨我进不了自己的办公室。门上的锁已经换掉。我的名字已从门上除去。

在联邦调查局工作三十年之后，我就这样离开了。

× × × × ×

“兹聘任你为美利坚合众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CAFO级特工人员，年薪3,200美元。”

这封信由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签署。我于1941年7月3日收到，在读信时心情是复杂的。最初是我的两个大学同学在进入联邦调查局后，建议我也申请到该局工作。我为了权衡得失，把申请书在抽屉里放了好几个星期。

尽管这是在日本轰炸珍珠港之前半年，即1941年年中，但美国参加欧战显然已经只是个时间问题。我当时很想参军，而且已经向陆军情报部门交上申请书，要求到国外去执行任务。

那时我在波士顿国内税务局工作。在我决定到联邦调查局应试时，我的上司说他不会批准我离职。于是，我找了波士顿国内税务局局长，他答应批准我走，但是只同意我去联邦调查局。他强调说，他决不会同意我到其他任何政府部门任职，接着他开始讲关于勇敢的特工人员和危险的罪犯的故

事，谈到我即将过多么激动人心和有意义的生活。在我后来的生涯中，从四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末，无论我到国内什么地方去，都会遇到成千成万各行各业的男男女女对联邦调查局怀有这种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印象。联邦调查局在公众中进行的宣传工作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等我在联邦调查局担任高级职务之后，我认识到埃德加·胡佛在公共关系方面确实创造了奇迹。

在通过了初试和获准离开税务局之后（陆军情报部门没有给我答复），有待我克服的唯一障碍是我自找的：我是不是真想参加联邦调查局？我对执法工作一窍不通，连学这一行也没有兴趣。

我的唯一志愿是到新英格兰的一所规模不大的学院教书。我在进入国内税务局之前，曾经在老家马萨诸塞州波尔顿镇当过英语教员。我的根在波尔顿，那是一个只有四百人左右的小镇，我生长的地方是我的父母经营了五十年的农场。我的愿望是在波尔顿或类似的小镇上安家。我之所以到波尔顿工作，只是因为我在那里可以半工半读，取得大学毕业文凭。但是，我知道若去当特工人员，就得放弃教育事业。联邦调查局的工作需要一个人的全部时间。

我当时心情很矛盾，就去找建议我申请的两名特工人员之一，向他提了一大堆问题，最后把我想好的一张问题单交给他。要是当时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看到这张写满怀疑和批评的问题单，他们绝不会雇用我。但是，我的朋友没有把我的问题单交出去。当时我对去联邦调查局工作仍然没有下决心，但他的回答说服了我，决定去试一试。1941年8月4日，五十个人到司法部报到，接受特工人员的训练，我是其中之一。我知道这不会是平凡的工作。我感到我们五十个人正站

在未知世界的门槛上。

刚到职时办了好多手续，同走上任何新工作岗位时的情况差不多：填表，在文件上签名，参观办公楼。在参观过程中，我看到一些青年妇女在看报和剪报，未免感到好奇，就停下来问一位姑娘她们在干什么。

她回答说，“剪批评局长的文章”。她还告诉我说，全国各地的分局都没有剪报部门，剪下来的文章寄给在华盛顿的胡佛。

后来我比较仔细地观察了我的同班学员，开始注意到我们五十个人有某些相似之处。虽然我们来自全国各地，出身于不同的环境，但是我们中间没有犹太人、黑人或西班牙血统的人。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胡佛的政策。

我的那位特工朋友曾经警告我说，班上大概会有一两个人给局里的领导人当密探；他还告诉我怎样识别他们。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都挑选刚从高中毕业就到局里来当文书的人接受密探训练。这些人只有十八岁左右，是很有雄心壮志的（有不少人上夜校，想取得法学学位或会计学位）。他们还在接受训练时就对联邦调查局忠心耿耿。有些念完大学或获得法学学位之后才进局工作的人，也可能盲目地忠于联邦调查局，但为数不多。过了好多年后，我了解到苏联的情报部门也是这样做的，它真正信任的人只是在苏联学校例如莫斯科的列宁学校受过训练的美国共产党人。

与此截然相反的就是象我这样的“外来户”。我们的年龄大于一般的学员。我们中间不少人在成为特工人员之前担任过负责的职务，并且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我们更有独立性，更加自信，不那么容易被权欲薰心的官僚们吓倒。在开始时，我们当中有些人甚至还对联邦调查局的政策提出

疑问。但是，我们很快就了解到，采取这种态度就必然会被迫早日退休。

学员持续不断地受到压力，以迫使他们俯首听命。密探的存在时刻威胁着言论自由。经常听到吓人的故事，讲的是有些特工人员违反了联邦调查局的规章制度，“因而被不光彩地解职”，以此就再也无法在任何政府部门找到工作。然而，尽管笼罩着恐惧和猜疑的迷雾，学员的积极性仍然很高。

我们这伙人劲头十足，有能力，学习勤奋，乐于作为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接受考验。我们当中有律师、教授、政府职员、商人、自由职业者、运动员、司法人员、工程师、保险公司审核员、记者和教师。训练班的一个教员说过：“这个班的整个质量证明联邦调查局吸收人员的办法是高明的。”我们怎么会不同意呢？

我们的教员一再对我们说，能够通过严格的审查和考核当上特工的人，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我们是“尖子”，是“精华”。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要比联邦政府其他人员“高上一大截”，就象联邦调查局本身显然要比联邦政府其它机构都高出一头一样。四十年代后期，胡佛曾经命令联邦调查局提供材料给联邦特工人员出身的通用食品总公司负责人汤姆斯·麦克达德，让他在杂志上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全世界最精干的班子》。

胡佛心里只用加了“最”字的词来形容联邦调查局。他认为局里的一切都是最好的。这种想法一直往下传给我们的教员。有一位教员向我们班解释说，联邦调查局的格言“我们从不结束任何案件”，比加拿大皇家骑警的格言“我们总能抓到要抓的人”高明。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这样看，因为“从

不结案”就意味着“永不结案”，但是我们谁也不想反驳那些严肃而又苦干的教员。

我们受了三个月的训。每天上午九点上课，晚上九点下课，一星期上五天，地点在华盛顿司法部或附近的维吉尼亚州关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有时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午还要加课。

有一位教员杰佩斯·罗吉斯给我印象特别深。他的长相和行动都符合我的期望：聪明，善于观察，知识渊博。讲起课来镇定自若和有耐心，随时都愿意停下来回答问题。

尽管如此，局里还是难于找到内行的教员讲授新开设的（对联邦调查局来说是新开设的）涉及国防问题的课程。同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间谍活动打交道，那同抓银行抢劫犯和绑票的土匪根本不是一回事。多年从事刑事案件的特工人员几乎得在一夜之间就掌握复杂的新侦查方法。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挑得起这样的担子。因此，联邦调查局的教员们是立了大功的。他们在业余时间大量加班加点，辛勤地为这项新工作做准备。其中有两个人特别突出：一个是爱德华·摩根， he 现在是华盛顿特区著名的律师；另一个是肯尼斯·麦金太， he 现在已经退休了。

摩根是个精力充沛的教员，然而他是温和的自由派，因此胡佛不信任他。摩根终于离职，胡佛于是将他的名字从联邦调查局的邮寄名单上划掉，而列入使人害怕的“禁止来往”的名单。但是，1976年联邦调查局一些现任和前任的特工人员因为刑事罪被司法部起诉时，摩根却被聘为这些人的辩护律师，这件事是带讽刺性的。

麦金太选错了职业。他应该到大学去当政治系教授。他也同摩根一样，知识渊博和有表达能力。我发现 he 异常客

观。然而，最终局里要求他提前退休，因为胡佛认为他的观点“过于客观”。

有一天，我们的教员宣布说胡佛先生要来向全班训话。接着就进行辅导，教我们在胡佛面前应该如何行动。在胡佛到来前的时刻，大厅两边都有十五至二十名特工人员默然肃立，使我们产生敬畏、惊奇和将要发生什么事情的感觉。我们完全沉默，聚精会神。胡佛讲话很快，而且明确、简单。他讲话的主题是联邦调查局的审查过程多么难通过。这是各期训练班百听不厌的主题。但是实际上他讲什么并无关系，他在那里一站就足够让我们把他看成一个伟大非凡的人物。

然而，他并没有使我们所有的人都信服，特别是未能使我的一个同学信服。这位同学在参加联邦调查局之前是一个生意兴隆的律师，他对联邦调查局及其领导和训练计划越来越不满。我始终记住我朋友讲过的密探问题，因此我十分谨慎，不随声附和，也不流露自己的怀疑。有一天吃午饭时，他严肃地看着我说：“见鬼去吧。萨利文，我知道你对这里的训练一定有看法。你要是什么都不肯说，那么我来说。这个机构过于强调宣传，而对调查却强调得不够。我将脱离这里去参军。等打起仗来，我就有了准备。”

我让他再考虑考虑，至少等分配到地方分局干一两个月以后再说。我相信具体执行任务的分局会强调执行法律，而不是强调纪律或公共关系。但他不象我有信心，几天后他就回家了。

我们训练中最令人兴奋的是火器射击。教员都是射击能手，课后他们会给我们讲好多血淋淋的枪战故事，有时讲玛·巴克尔和阿尔文·卡比斯这样的危险匪徒，有时讲联邦

调查局英雄，例如沃尔特·瓦尔什心脏下方中枪之后，仍然把袭击他的人打死。还有打死约翰·狄林格的查尔斯·温斯泰德。正是瓦尔什和温斯泰德这样的人使联邦调查局声名赫赫。四十年代进去的我们这些青年人，享受了联邦调查局的荣誉，尽管我们自己还没有作出任何贡献。

尽管火器训练是很严肃的课程，总是包含危险的因素，但是我们的教员也有轻松的时刻。有一位教员已经有五十好几了，他以富有幽默感闻名，能使最严肃的学员也笑出声来。可是有次他却成为人们捉弄的对象。这次的玩笑是同我们班有关系的。当我们刚到关蒂科开始训练时，有人把一个“绝密消息”告诉我们班的一位学员：有一个射击教员专会设法逗全体发笑，来考验我们的态度是否严肃。任何学员只要笑出声来，联邦调查局就会在他的档案里留下不光彩的评语。

尽管说要保密，这个要淘汰不合格学员的恶毒新花招却立刻传开。我们全班的人毫无例外地都相信了这样一个很不可能故事。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从我们开始接受联邦调查局训练以来，在“全世界最精干的班子”中这种妄想狂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那位射击教员在班上讲第一个笑话（这个笑话确实可笑）时，我们已经有了充分思想准备，因此没有一个学员大笑。教员又试了一次，讲了另一个也很可笑的笑话，但这时他的信心已经比较差了。班上甚至没有一个人微笑。下课后走出教室时，我们自以为是挫败了联邦调查局的花招，证明了自己是真正的男子汉。

这位教员明显地感到不安，他去请教他的同事们。但他们在编造上述故事的那位教员的带领下，众口一词地断言他不再能理解青年一代。但是开玩笑的人还不就此为止。受人捉弄的教员心绪紊乱地写了一封信给胡佛要求调动工作。别

人假装已替他**把信寄出**。这位不幸的教员盼着答复，而其他人**都坐在旁边看热闹**，还故意让他去猜为什么胡佛没有答复他的请求。他陷入了妄想狂，最后他断定胡佛**一定在生他的气**。又过了一个星期，他神经紧张到快要崩裂了，终于决定去问胡佛的秘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这时，他的同事们才告诉他开了什么玩笑。

三个月之后，我们考了**6门主课**，其中包括**联邦刑法和调查技巧**，还有**9门次要课程**，从法庭技巧、火器运用直到搜查犯罪现场和公开讲演。当时并没有教如何进行盗窃和私拆信件，尽管今天有一些国会议员暗示训练班教过这些课，从而在政治上捞到不少好处。

及格要85分。但是我们交卷之后再也看不到试卷，因此及格与否只能相信局里的话。我的感觉是，联邦调查局的自己人（即密探），总**能及格**；而那些对联邦调查局采取“错误态度”的学员，总是**不及格**。

联邦调查局有它自己的办法来打发它不喜欢的人。我曾经看到胡佛一再派调查组去收集那些得罪过他的特工人员的材料，其中有些人是因为不服从命令，有些人是因为驾驶没有擦干净的汽车。胡佛一度特别喜欢人们把车擦得闪闪发光。同我在靠墨西哥边界一起工作的一个特工人员常常笑着对我说：“比尔，别去为你正在调查的案子操心，只是你上班时千万把车擦干净，要不你才真会倒楣。”

考试结束后，我一边在等着知道自己是否及格和猜测第一次分配给我什么任务，一边仔细考虑了联邦调查局的情况和我在执法工作中的前途。我在受训期间了解到的有关联邦调查局的情况，无助于克服我一直持有的疑虑。我真的适合去那里工作吗？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妻子，谈了我的思想混

乱，她回信要我趁还来得及的时候赶快脱身。

联邦调查局的优越感以及强调盲目服从和严格纪律，使我感到格格不入。然而那里的工作却有可能是激动人心的和真正有意义的。我从好的方面想：任何大机关总归要求它的职员效忠。严格的挑选和严格的训练有助于剔除软弱的特工人员，他们将无法经受分局工作的压力。我受到的训练和在班上学到的东西打开了我的眼界。我决定试一段时间。

1941年9月26日，我接到了第一个指令，到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分局。我感到好奇。我从来没有到远离波尔顿的地方去旅行过。有机会看一看中西部是很有吸引力的。我象同班的其他学员一样，热望能有机会检验我新学到的知识。我收拾行李启程时，心情又兴奋，又好奇，又有怀疑。谁知道呢？我甚至有可能爱上这项工作。

1941年12月，在我抵达密尔沃基两个月后，我坐在一栋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共产党党部也在这栋楼里。我戴着耳机在记录共产党开会的情况。我们在他们的会议室安了一个“窃听器”，即麦克风，但是当时还没有录音机。

那次会上，共产党人刚收到日本轰炸珍珠港的消息。我记得他们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而且开始激动地议论。直到他们的领导人约瑟芬·诺德斯特兰讲话时，他们才安静下来。诺德斯特兰用词慎重，讲话方式完全不同于其他人。我把她的话都记了下来。她说：“这是我们从来没有过的最好机会，我们终于参战了。日本人做了我们未能做到的事：让美国参了战。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打进各种爱国组织里去。这样做了以后我们就会受到人们的尊重，而这是我们已往从未得到过的。让我们比那些最爱国的非共产党人士更加爱国。”会上没有任何人对死在珍珠港的许多美国人表示一点感情。